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简史

徐棣华 王亚平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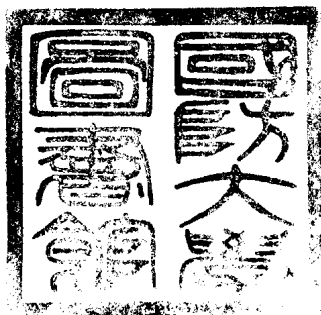
中国物资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经济简史

(1976—1991)

徐棣华 王亚平 编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京) 新登字090号

7001812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简史

(1976—1991)

徐棣华 王亚平 编著

•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97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47—0414—8/F·0177 定价: 6.20元

(凡购买中国物资出版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
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 言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整整15年。这1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三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建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创业的起始阶段，也是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由于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摧残下，经过12年战乱破坏的十分落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物价飞涨，投机猖獗，新政权不得不首先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同时着重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全国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所以人们通常称这三年为恢复时期。从1953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着重进行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农业（包括个体手工业）组织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仅用4年时间

就提前完成了原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以苏联帮助设计建设的156项为骨干的工业化建设有计划起步，在当时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问题。“一化三改”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所以人们通常称这四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6年9月“八大”一次会议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历尽曲折、国民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前进的时期。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首要和中心任务。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必然是一个探索过程，难免会有曲折。苏联是当时唯一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又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就很自然地搬了过来。“八大”一次会议前后，我国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探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造成了1959—1961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出现大起大落。1960年冬起，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用了整整5年时间，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恢复和发展。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并未得到彻底清算，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政治上的“左”倾观点又不断发展，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不仅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使“四个现代化”没有得到实行；愈来愈左的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社会主义建设迷失了方向。这个以指导思想“左”倾为主要标志的阶段，整整延续了20年，在世界上不少后进国家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里，错过了许多次大好机会。在这20年中，前10年基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曲折中前进，人们通常称为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时期；后1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但遭到巨大损失，人们通常称为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在前28年基础上起步的。与第一、第二阶段不同，这个阶段前进的起点比较高。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它是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其次，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三，培养起了一支经过风浪锻炼的建设大军和已经掌握核技术、人造卫星

等尖端技术的科技队伍。第四，积累了包括正反两方面丰富的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但是，这个阶段毕竟刚从10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又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的束缚，所以历史赋予它的，首先是纠正、清算前20年“左”的错误，和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巨任务。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们高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树立起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鲜明旗帜，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尽管这一阶段如同历史上任何阶段一样，也有曲折和失误，但它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在经历了严重的历史性挫折和严肃的反思基础上，真正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阶段；更是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特征，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阶段。这个阶段，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回顾和再现这15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而又不平坦的历程，编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史，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和力量的宝库。人们为了前进，总是要不断地回顾、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作为继续前进的参考。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回顾、反思、总结刚刚逝去的这一段充满矛盾、却蓬勃前进的岁月，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我国在战略和体制转变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律，鼓舞我们排除万难，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本书是一部记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简史，

根据薛暮桥同志创导的按时期、抓大事的研究方法，以经济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深化、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展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曲折为主要线索，分四个小阶段进行叙述：（1）国民经济在徘徊中前进（1976年10月—1978年12月）。（2）国民经济调整和以农村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开放起步（1978年12月—1984年10月）。（3）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的初步展开和国民经济加速发展中过热的出现与治理（1984年10月—1988年8月）。（4）三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1988年9月—1991年9月）。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开拓阶段，编写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发展史更是一种尝试。由于研究的客体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现象和本质尚未经过历史的沉淀而有所区分，重大决策的是非曲直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所以，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主要力求理清经济发展的脉络，经验的总结则是初步的、很不成熟的。但愿它能成为一片绿叶，在经济史研究的园地中增添一丝春色。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国民经济在徘徊中前进	(1)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国内外形势	(1)
第二节 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10)
第三节 “左”的指导思想的延续与新失误	(19)
第二章 经济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变	(28)
第一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8)
第二节 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38)
第三章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三年调整	(49)
第一节 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提出	(49)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	(55)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	(62)
第四章 在经济调整中开始改革开放	(74)
第一节 农村改革先行一步	(74)
第二节 城市改革的开始	(85)
第三节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95)
第五章 宏伟的建设纲领和“六五”计划	(104)
第一节 财政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	(104)
第二节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战略部署	(110)
第三节 进一步调整改革，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	

根本好转·····	(117)
第四节 “六五”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完成·····	(132)
第六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138)
第一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	(138)
第二节 加快改革开放的重大步骤·····	(144)
第三节 经济运行格局的变化·····	(155)
第四节 经济繁荣中过热的出现及治理·····	(163)
第七章 “七五”计划的制定和两年经济微调·····	(173)
第一节 “七五”计划的制订和公布·····	(173)
第二节 努力平衡总量，逐步稳定经济·····	(184)
第三节 加强宏观调控，继续搞活经济·····	(198)
第八章 以改革总揽全局，推动经济发展·····	(209)
第一节 1987年底的经济形势·····	(209)
第二节 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决策·····	(219)
第三节 在通货膨胀中改革迈出新步伐·····	(225)
第九章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	(240)
第一节 治理整顿方针的提出和初步实施·····	(240)
第二节 进一步治理整顿，不断深化改革·····	(254)
第十章 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	(274)
第一节 巨大的成就·····	(274)
第二节 宝贵的经验·····	(285)
第三节 迎接90年代经济的新发展·····	(297)
附：国民经济发展大事记·····	(304)
后记·····	(414)

第一章 国民经济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国内外形势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尽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共同排除了万难，坚持不懈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并且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愈来愈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我国经济陷入了畸形发展的困境。1976年再度掀起的政治风波，加上唐山地震的影响，更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表现在：

第一，经济起伏动荡，发展迟缓。

“文革”10年期间，曾经三次出现负增长。夺权、武斗、派性斗争对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无政府主义泛滥导致的生产瘫痪、半瘫痪状况，使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不到5%，比正常年份降低了2个百分点左右。同期人口却因长期无人过问而失去控制，增加了近2亿人口，因此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9%，1976年只比1966年多45

元。1976年工农业产值只比上年增长1.7%，国民收入下降6.3%，经济状况更趋恶化。

第二，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

一是积累率过高，1970年以后一直在30%以上。在国民收入总额增长较慢而人口却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

二是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强调“以钢为纲”，在全国投资总额中有一半用于重工业，因此1976年与1966年相比，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由64%上升到72.3%，其中重工业由32.7%上升到40.3%，农业由35.9%下降到27.7%。我国是人口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大国，吃饭穿衣问题很大，而且80%的人依靠农业为生，农轻重三者大体保持各1/3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现在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突出增长，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困难。

农业内部片面强调发展粮食生产，忽视、排挤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1976年油料生产还没有达到1952年水平，棉花比1965年低4万吨，造成工业原料紧张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匮乏。为了增产粮食，有的地区毁林弃牧、围湖围海造田，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趋于衰退。工业内部不仅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加工制造业与原料工业也不适应，加上技术落后，消耗大、质量低、销路差、造成大量积压。能源工业为满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需要，超能力开采，造成油田矿山采储采掘比失调。

三是工农业生产与交通运输、商业流通脱节。50年代末期以来，交通运输和商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1966年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3.3%和7.5%。“文革”中虽然对铁路建设投资不少，但由于过分突出内地新线建设，忽视

运输繁忙地段的旧线改造，使运输能力越来越不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一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25倍，而货物周转量增长不到7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因农村经济更趋封闭、城市商业网点撤并、集市贸易取消而只增83%（按现价计算）。因此1976年两者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为2.9%和5.6%，使商品流通更加不畅，阻滞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

四是科技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知识分子普遍被歧视和压制，高等学校停课“闹革命”，使人才培养整整间隔了15年之久。不仅造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而且在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断层。

第三，经济体制更趋僵化、封闭。

我国50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它使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三大改造中也存在要求过急、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的偏差。后来“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不顾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并且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形式越来越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转化。1976年在工业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占80%，集体经济不到20%，个体和其他经济几乎没有；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占90.3%，集体商业（包括供销社）占7.9%，个体商业占0.2%，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占1.6%。在农业生产中，不仅急于向更高的公有制过渡，而且几次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恢复时期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

基础上学习苏联经验逐步建立起来的，当时为了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强调了加强集中统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这种管理体制的缺陷逐步暴露出来。主要问题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而在组织和管理中忽视或违背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应遵循的规律。第一，经济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在国家行政部门手中，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第二，过多地实行直接计划控制，忽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第三，分配中国家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吃国家“大锅饭”；流通中生产资料实行统一调拨，主要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或统购包销，企业不负经济责任；第四，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域管理经济，割裂了国内经济的内在联系；对外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未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为了解决经济管理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弊端，从1956年起我国曾多次试图进行体制改革，实行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试验。但在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改革主要是在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上兜圈子，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10年动乱中把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贯彻按劳分配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判，把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当作崇洋媚外来反对，我国经营管理体制更趋僵化和封闭。

反映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进一步排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由于在农村严格限制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社员一律不许经营商业，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由于在城镇取消个体经济，封闭集贸市场，集体企业的经营类同国营企业，取消工业企业的自销门市部，大量工农业产品被纳入国营商业统一收购、调拨和销

售，使商品流通范围越来越小，渠道越来越少。至于价格，从1967年起就一律冻结，根本不能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

反映在劳动者与集体的关系上，由于工矿企业取消奖金和计件工资，农村人民公社按劳动力等级实行固定工分制，进一步助长了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倾向。

反映在国家与地方、企业的关系上，由于当时强调战备和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国家把许多权力和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要求各省尽快实现主要产品自给，做到自成体系，各自为战。这虽有利于各省发展地方工业，但这样盲目下放权力，既削弱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又加剧了地区分割。不少地方为了实现自给自足，大量重复建设，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企业在地方行政管理下，由于各级各类地方行政部门层层增加指令性计划指标，进一步成为行政机构附属品。许多中央下放的大企业，由于原来面向全国的供销关系被割断，地方又无力解决，经营更加困难。

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曾给对外联系造成很大影响，“文革”中把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关系对立起来，使我国更加封闭。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额从1967年起连年下降；引进工作也从1968年起中断。已经引进的设备，由于普遍地发生了围攻和驱逐外国技术人员事件而使工程施工延期，刚建成的项目因没有外国技术专家一起试调验收而生产不正常。1972年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我国对外贸易有所发展并且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引进了26套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建成了一批具有现代水平的骨干企业。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与半

封闭状态。就是这点小小的进步，也因“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等而受到严重干扰。因而在当时世界新技术蓬勃发展、国际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我国又一次错过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经济的大好机会。

第四，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市场商品匮乏。

由于政治上的动乱破坏、经济上结构失调、体制方面僵化封闭，加上管理制度废弛，内地建设中错误地强调靠山、分散、进洞，结果导致全社会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市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

一是投入多，产出少，亏损增加。最集中的反映是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5元，1963—1965年为57元，“三五”、“四五”时期则分别降为26元和16元。在工业方面，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1976年比1966年下降了44.1%，而每百元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却增加了57%。亏损企业占1/3以上，全年亏损额高达73亿元。在商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率只有9.7%，远低于1957年20%的水平；流动资金的周转次数为1.88次，比历史较好水平的1957年慢了0.33次。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时期的83.7%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59.5%和61.4%，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由“一五”的6.5年增加到8.8年与10.7年。

二是市场趋于萎缩。1967年到1976年人民生活必需的农副产品的社会收购量，长期徘徊不前，有的甚至有所下降。据统计，1976年食用植物油比1966年减少了33.1亿斤，菜羊减少128.5万头，家禽减少了2607.6万只，鲜蛋减少了177.3

万担。为了保证供应，不得不挖库存。如食油1976年的库存量比1966年减少了1/3。10年中粮食是年年增产的，但收购量也几度下降，1976年只比1966年增加49亿斤。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50年代每年调出100多亿斤粮食支援全国，1976年需要国家调入50亿斤；全国第一个粮食上纲要的浙江省，也由鱼米之乡变为吃返销粮。日用工业消费品的收购，因轻工业生产发展缓慢、品种规格单一，难于有效增长，有的还积压在仓库。因此，在人口增加、社会基本生活消费品需求长期超过商品供应可能的情况下，市场商品缺口越来越大。不仅粮食、棉花、食油、猪、禽、蛋、水产品、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供应紧张，而且棉布、纺织品、毛线、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搪瓷制品、铝制品、肥皂、火柴、铁锅、饭碗等日用工业品及民用煤的供应也全面紧张。凭票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有的地方消费品凭票供应最多时曾达到50多种，有时虽有票证也无货供应。

三是国库逐渐亏空。我国经过五年调整，财力状况逐年好转。1966年财政收入558.7亿元，当年结余17亿元。但“文革”开始连续两年收入大幅度下降，虽然国家极力压缩财政支出，1967、1968年基本建设拨款只有1966年的2/3和1/2。仍发生了22亿元的赤字。为了使扩大再生产能够保持一定的规模，在企业生产逐步走向稳定后，国家开始增加基建投资和增拨流动资金，但终因财源虚弱而使财政支出十分紧张，最后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度冲击生产时，财政收支又连续三年出现赤字。其中1976年赤字达29.6亿元，占支出的3.6%，如加上虚盈实亏数字，比重将更大。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降低。